

关于邓小平领导 1975 年 整顿若干问题的探讨

□ 程中原

[摘要] 对于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但仍然有若干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包括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1975 年整顿为何突然中断? 1975 年整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的思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能不能说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等。本文拟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谈一些新的见解,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

[关键词] 1975 年整顿;“全面整顿”;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起点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 1975 年整顿是邓小平人生旅程中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对于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不过,仍然有若干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主要是: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1975 年整顿为何突然中断? 1975 年整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的思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能不能说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本人在研究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著述中对这些问题曾经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回答。在纪念 1975 年整顿 40 周年之际,本人拟对以上问题,不避重复,发表一些个人的研究心得,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

一、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是不是“全面整顿”?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从 1975 年整顿的实践中去寻找。让我们来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领导 1975 年整顿的。

先看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指导思想。

从 1974 年 8 月至 1975 年 1 月,毛泽东先后作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

济搞上去三项指示。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领导 1975 年整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 20 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 1975 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的气势。

再看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发展过程。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 页。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毛泽东早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与此同时,雷厉风行地着手领导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也是重点整顿阶段,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在此期间,“四人帮”围绕“反经验主义”问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有力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王洪文被迫写了检查。王洪文被派往外地。从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接连对“周扬一案”(7月2日)和电影《创业》(7月25日)作出批示,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7月14日),还批准邓小平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7月初)。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1975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从7月起,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整顿铺开和深入的基础上,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具体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要确定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必须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十年做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发展

国民经济的十年长远规划。邓小平针对浙江、河南等地严重存在的“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全面整顿”。他在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毛泽东赞成;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向全党全国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并进而明确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九个方面。这时,指导经济领域整顿的《工业二十条》和指导教科文领域整顿的《汇报提纲》已经基本完成,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社论,正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1975年整顿准备进入“全面整顿”阶段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进行了准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了。

从上述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三个发展阶段可见,邓小平对“全面整顿”作了部署,进行了准备,但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而中断了。所以,把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称为“全面整顿”是不够确切的。应该按实际情况称之为“1975年整顿”,或者按照邓小平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中所说“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1975年9月27日和10月4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各方面都要整顿”,称之为“1975年各方面整顿”。

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说明”的提法,称为“各项工作的整顿”,也是可以的。该书注19谓:“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也没有称“全面整顿”。该书收入邓小平1975年9月27日和10月4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两次插话,用的标题为《各方面都要整顿》;该书注19谓:“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也都没有采用“全面整顿”的说法。

二、1975年整顿为何突然中断

1975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整顿进入科技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就酝酿要成立一个机构,作为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6月15日,邓小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快尖锐起来。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这次谈话后第二天,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满意,并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5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认为“信的动机不纯”,“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并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看法的时候,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于11月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们。毛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面主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

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1975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中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

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还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

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意见,邓小平于1975年10月14日转告胡乔木。据1975年10月14日胡乔木的日记。

刘冰等人的信写于10月7日。10月13日晚由教育部负责人李琦转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当晚即交给了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1976年1月21日上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不是这样。他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它的本质特征,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发展或存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他主张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必要的补充;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

应该看到,毛泽东信奉的那种社会主义,也不仅是他个人的追求,它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一种思潮。他们追求精神上的平等,在他们看来,穷与富,经济发达与否,并不重要。甚至认为,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搞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上抱着这种极左思潮的人还在进行批判。原法中友协副主席还写了一本名为《大跃进》的书,批判改革开放不是进而是退,而且是大跃进。邓小平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发展生产力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不了,按需分配也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出来,战胜不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三个层面上存在分歧和矛盾,这就决定了 1975 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再一次被打下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三、1975 年整顿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第一,1975 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

邓小平说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

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早在 1975 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第二,1975 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

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说到改革,其实在 1974 年到 1975 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还说 1976 年的四五运动“证明,1974 年到 1975 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江泽民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三,1975 年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

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调整、1972 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 1975 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 1975 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 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四、邓小平在 1975 年整顿中的思想理论在形成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能不能说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作为 1975 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领导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0 页。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人民日报》1997 年 2 月 25 日。

顿取得的巨大成功,“批邓反右”遭受的沉重打击,四五运动中受到的拥戴,再度复出后创造的辉煌,构成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篇章。而由于历史的特殊安排,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混乱局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胡乔木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分析,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就是从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和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个方面,说明了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是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起点。

在这里,本人还将列举1975年整顿中已经提出或萌发的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

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毛泽东同志三条重要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是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

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不仅要路线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我们不能吹,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时间。

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

今冬明春,在整党的同时,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

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要大讲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四人帮”的报刊宣传“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不利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

不利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

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要发挥专业科研机构和队伍的骨干作用。大中型企业要有自己的研究试验机构。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必须虚心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要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就必须增加出口。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多出口。为了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的开发,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按照国际贸易中通行做法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由他们供应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的成套设备,然后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偿还。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

要坚决消除“三废”污染,保护环境,保护职工身体健康。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

要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上述一系列言论,是日后形成完整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观点、重要思想。据此,我们认定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有根有据的,是符合实际的,是站得住脚的。《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分卷就是以1975年整顿为界碑的。其第二卷从1975年开始,并在《第二版出版说明》中指明,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在七十年代中”就“已经提出”。这一论断正可成为本文重申的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邓小平理论起点的有力佐证。

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